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四十八期 2002年12月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o. 48, December 2002.

騷動流移的虛構商品：
「勞工流移」專題導讀

夏曉鶻

The Unquiet Migration of Fictive Commodity:
An Introduction to *Labor Migration*

by
Hsiao-Chuan Hsia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底，數百名戲稱自己是幽靈人口的「大陸新娘」，帶著孩子，手舉「我要身份證」、「反居留延長」以及「我愛台灣」等標語，走上街頭，吸引台灣人民或懷疑或同情的目光。她們說：「我們是台灣媳婦，幫台灣人養兒育女，為什麼我們的地位比不上東南亞新娘？」數年來，為了能在台灣安身立命，她們不斷爭取工作權和身份證。

據官方統計，台灣現今每四對新婚夫妻之中，便有一對是國人與外籍配偶聯姻，外籍配偶中又以東南亞及大陸新娘佔大宗。這群來自東南亞的「外籍新娘」和中國大陸的「大陸新娘」不僅完成了許多農工階級家庭傳宗接代的心願，更成了台灣廉價勞動力的來源。除了以婚姻形式入境台灣，另有三十多萬「外籍勞工」，和不能「上岸」的「大陸漁工」投入台灣的生產行列。隨著愈來愈多的境外人口進入台灣，「移民」問題漸漸浮上檯面，幾年光景，很快地我們意識到台灣政府並沒有移民政策，而一般民眾甚至社運團體對此相關議題亦相當陌生，甚至漠視。究竟他們為何遷移？處境為何？大陸新娘和勞工為何遭受更多的不平等對待？什麼是公民權？而誰才有權利成為台灣的「公民」？

台灣的情況從來無法孤立於世界局勢而觀之，移民問題亦然。睽諸世界，號稱「民族熔爐」的美國已進入第四波移民潮，二十世紀末移民已佔總人口近 10%；歐洲各國也正經歷移民衝擊，外籍居民在德國佔總人口的 8.2%，在法國佔 6.4%，瑞士更高達 16.3% (Brettell and Holifield, 2000)，即使在原本嚴格限制移民的日本也在八〇年代准許外籍勞工進入；而在發展中國家出現的大規模人口流動，包括非洲的難民，及亞洲和中東地區的客工 (guest workers)，更引起部份論者稱為「全球流移危機」(global migration crisis) (Weiner, 1995)、將二十世紀後半葉定性為「流移的年代」(age of migration) (Castles and Miller, 1993)。

移工與資本主義發展

當今遠距人口流動的規模確實引人注目，但絕非新鮮事，而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勞動力為剩餘價值的來源，因此不斷開發新的廉價勞動力，便是資本主義得以不斷擴張的必要條件，「世界性的勞動力市場」也因應而生。無論是早年愛爾蘭移民到英國，或是黑奴販賣 (slave trade) 所推動的洲際三角貿易，到今日所謂「流移的年代」，皆是資本主義發展、結構重整的過程裡，所不可分離的現象。此外，在資本主義體系下所產生的人口流動不是抽象的「人口」 (population)，而是逐漸被整合到這個生產過程中的勞動人口 (吳挺鋒，2002)，因此「勞工流移」 (labor migration) 比「人口流動」 (population movement) 更能精確指出其性質，亦以此名為本專題的名稱。

所謂「勞工流移」不僅止於跨國，甚至跨洲的勞工遷移，亦包含國境內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湧向城市的流動，例如中國的「民工潮」。這個專題收錄了七篇文章，分別從政治經濟、文化研究與行動研究的取徑，探討資本國際化下的勞工流移 (labor migration) 現象所衍生的各種議題，包括勞工流移的結構性因素、移工在接受地 (國) 的處境、移工自我認同的分裂與整合、接受地歧視移工的文化根源，以及移工的公民權 (人權) 運動的現況、困境及出路。

資本主義的擴張仰賴勞動力市場，而勞動力市場向來是政治性的場域而非純經濟的範疇，始終糾雜了商品化與去商品化的鬥爭。移工現象正涉及了勞動力商品化及去商品化等資本主義發展的核心問題，不僅具有學術研究的價值，更是社會運動的重要課題，因此本專輯的作者群除了學者之外，特別邀請移工組織工作者總結第一線運動經驗，希望透過學術與實踐的對話，讓台灣的讀者對移工議題有更深刻的認識與反思。

資本主義發展所需要的勞動力並非自然形成，而是一連串的政治行動的結果，從英國的「圈地運動」、台灣的「以農養工」和對原住民

部落的山林政策，乃至於中國大陸近年來的農地政策，其目的皆在於擠壓農村經濟，促使生產者與生產資料分離，使農民必須透過販賣自身勞力賺取薪資糊口，因而造成了農村人口大規模外移。

然而，勞動力作為商品有其特殊性，因為它並非如其他商品，只為了在市場上販售而生產，其承載者正是活生生的人，博藍尼 (Polanyi, K.) 因此稱之為「虛構的商品」(fictive commodity)。因此資本家在購買勞動力的同時，亦必須面對其再生產的方方面面，包括勞動力的恢復 (renewal) 和其世代延續 (maintenance)，亦即住宅、公衛、休閒、生育、養育等等問題。為了擴大積累，如何將再生產成本降至最低，便成了資本家的重要課題。然而，出賣勞動力的勞工畢竟是「人」，資本家如何能肆無忌憚地不顧勞工的各種作為人的需求，於此，意識型態的建構扮演「合理化」的關鍵性角色。帝國主義擴張時期所發展出的黑奴貿易，除了強大的經濟趨力外，將白人／黑人建構成文明／野蠻的對立，使得各種不合人道的行為獲得道德的正當性，亦是使得奴隸貿易得以遂行的重要因素。異常殘酷的奴隸勞動引發了各種反叛，使得透過政治、軍事鎮壓的成本愈見高漲，終於導致奴隸貿易的終止。然而，推動勞工流移的經濟和意識型態趨力並未告結，反而以更細緻的方式流竄。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形成了區域間不平等發展，因生存的需求和意識的想望，讓較低度開發區域的人，流移他鄉，成了較高度發展地區的「客工」(guest workers)，亦成了資本主義發展蕭條時期民怨的出口、政治的代罪羔羊，民族國家的邊界管制 (border control) 益愈緊縮，暫緩了移工熱潮。

二次大戰結束，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廉價勞動力的逐漸枯竭，需要輸入境外勞工，跨境勞工流移遂再度活絡。然而，移工乃至於移民在西方國家境內的各種再生產成本日漸升高，當移工亦加入了社會再生產的鬥爭時，西方資本有了另外的選擇——出走。資本流動相對於勞動力流動有顯著的不對稱性，能輕易地突破國族疆界，於是，資本找到了第三世界充沛的廉價勞動力；而汲汲於原始資本積累的第三

世界國家，則以嚴厲規訓勞工、各種優惠投資的條件，吸引著西方工業國家的資本。崛起於七〇年代新國際分工情勢下的東亞新興工業國家，隨著工業化而漸漸地失去原有的競爭力，不僅失去對外資的吸引力，連民族資本家的腳步亦漸無能挽留。於是，從周邊較低度發展國家引進「外籍勞工」成了他們力挽頹勢的奮力一搏。原本號稱只是「暫時性補充」的外勞，却因其更低廉的價格為資本家所求而長久駐留他國，這群被界定為「永久的客工」，不僅讓新興工業國家壓低成本而獲利，更成為母國經濟的重要來源。移工，因其生產和再生產的分離，同時成了輸出國和輸入國資本積累的重要法門。

在原本各國資本家和政府「各取所需」的分工佈局下，一切看來那麼地「順當」時，中國市場的開放，擾亂了各國資本的腳步。

中國磁場內的近況

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發表了中國的開門宣言，世界資本主義蜂擁而入，找到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消費與勞動力市場。受到中國強大磁吸作用的影響，中國市場價格幾乎就等於世界市場價格，全球資本再生產的利潤率壓低至前所未有的境地，失業率普遍上揚，通貨緊縮，各國境內製造業／服務業工人的勞動競爭力下滑。當中國內地／農村的勞動力被吸至沿海「世界工廠」時，台灣的製造業／服務業亦大舉西進，造成部份失業勞工回流農村和山地部落的現象。因應中國資本市場的崛起，台灣以及周邊出口導向的國家紛紛重整腳步，企圖殺出重圍，找到生路，而枉顧本國勞工生存權引進更為廉價的「外勞」也成了諸多新興工業國家的突圍策略。

鄭怡雯的「誰來上崗？」，清晰地勾勒出七〇年代末以來中國逐漸資本主義化的重要理路，論證了農民工的流移過程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為中國整合入世界體系的基調，以完成市場機制對計劃機制的置換任務。城市的全民所有制和農村的集體所有制並存，且集體經濟的相對脆弱，使農村率先成了中國改革的潰

堤口，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培育也由此開展。

七〇年代末中國改革方針的第一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土地使用權成了每個農民私人所有，一九八五年取消「統購統銷」，合同定購制取而代之，使商品經營的權力與市場風險由農戶承擔，加以取消糧票制度、城市企業用工制度改革及非國有經濟成分的發展下，一九五八年建立的戶籍制度對流動自由產生限制的物質基礎逐一鬆動，從而拓展出農民進城打工的空間。

改革開放以來將農民從深耕的土地中掘起，但八九年風起雲湧的民工潮却是當局所料未及，傳媒以「盲流」稱之。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市場派佔上風的態勢已趨明朗，十四屆三中全會首次明確提出了「發展勞動力市場」，勞動力商品論不再是個禁忌；改革發展步伐遽然加快，就業需求量因而大增，加以沿海內陸發展差距的持續擴大，更加速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外出，而在市場經濟已取得主導地位的情境下，媒體改稱「民工潮」，不再以「盲流」稱之。

為了適應原戶籍制度物質基礎崩解而來的流動自由，一九八五年開始施行居民身份證制度，多樣的收費和辦證加諸農民工身上的束縛，形成有如對外國「客工」的管控，對於能「帶資入戶」或是資金進駐的「管理」人才，輕易便可入戶。此種將外來人口分為兩類的作法與台灣和其他各國選擇性的外來人口規範一樣，唯一不同的是，一是以民族國家的界線來進行運作，透過公民權的授予與否來吸納那些有資源的人，同時處置外勞作為一種「必要之惡」，另一則是在同一主權國家內，擁有相同國籍却面臨不同制度規範。

農民工原已惡劣的城市就業生活，因九〇年代中期「下崗」職工激增，愈見惡化。中國的城市勞動制度改革於一九八六年開始深入企業，國企招工改採勞動合同制，國家不再扮演照顧就業的角色。到了九〇年代，勞動制度更進一步讓不存在合同期限的固定工「下崗」，原企業在一定的協議期間內仍提供其基本生活保障及社會保險待遇，並引導幫助下崗職工實現再就業，一旦找到工作，即解除與原企業關係。

在下崗職工日益增多的城市，限制農民工在城市的就業成了再就業工程的必須，來自農村屬半無產的勞動者，他們「有也不足」的土地，竟成了他們可忍受較低工資起點以及工作不穩定的口實。大量農民工轉入「地下」淪為黑工，在不合法律規範前提下建立的勞動關係，強化了民工對企業的依賴，而企業更能予取予求。而下崗職工的「隱性就業」因企業尚未與之終止勞動關係而須支付基本生活津貼和社會保險，得以低價的姿態參與市場競爭。另一方面，中國雖規定外出打工者與其他職工一樣能享有社會保險，但農民工為了掙口飯吃，不敢／不願爭取，好以更低價格出售自己的勞力。

國家角色

從鄭怡雯的文章我們清楚地看到資本國際化下國家的角色並未消失，反而是積極地透過各種政策加速市場的形成與壯大。不僅有「姓社」「姓資」之爭的中國如此，向來是資本主義的菲律賓，國家亦扮演著關鍵角色。致力於移工運動的「亞太移駐勞工工作團」的文章便指證歷歷地道出，菲律賓政府為回應資本主義全球化，全面採取自由化、私有化和去管制化政策，而「勞力出口計劃」便成為歷任政權解決失業以及因貧困所帶來的社會、政治動盪的策略，並成為國家最重要的財政來源。菲律賓政府的勞動商品化策略始於馬可仕時期，政策名稱雖有更迭，但目標一致，且愈見具體而有系統，不僅設有總管勞力出口的專責機構 POEA (Philippine Overseas Employment Administration)，在接收國亦設置監督、行銷、招募等工作的機制，如在台灣的 MECO (Manila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這些構機美其名為是為了菲律賓人民解決就業及相關問題，實質上設下種種關卡吸取海外菲律賓勞工的血汗錢，透過稅收、各種文件費用、匯款等，提高 GNP，成為國家財富的最大來源。

移工處境

資本主義發展下的移工，不僅成了輸出國獲取原始資本積累所需資金之主要來源，更因價廉成爲輸入國擴大資本積累的重要策略，輸出和輸入國皆以極大化移工之剩餘價值爲目的，而移工的生產與再生產的被迫割離，是其比本勞更受資本案青睞的關鍵，亦形成了移工處境的重要架構。由亞太移駐勞工工作團的調查報告可知，系統輸出勞力歷史最悠久的菲律賓政府，不僅未善盡保護海外勞工的責任，更放任仲介從中抽取高額費用。因爲印尼、越南等國跟進勞力輸出政策，菲律賓政府爲確保其海外勞動力市場的優勢，而放任輸入國訂定各種不利移工的勞動條件，甚至在台灣政府轉向引進更低廉而易受控制的印尼和越南勞工時，菲國政府却指責自己的海外勞工「太愛組工會、太會爭取權益」。至於輸入國，則不僅想方設法地剝削移工的生產力，更以種種規定降低移工勞力再生產的成本。從事工運多年的龔尤倩分析了台灣外勞政策如何以「控制管理」爲主軸，透過身體檢查、禁孕條款、不得自由轉換雇主等措施，將移工物化爲純粹商品，無視於移工作爲「外國人」的各種社會空間、七情六慾的需求，並在法制上確保移工無法因居留年限過長（六年以上）而得以獲取公民權。而台灣特殊的國際處境，更使台灣政府露骨地以移工權益爲要脅他們在外交待遇上回饋；而大陸勞工在兩岸緊張關係下，比起東南亞籍的移工，處境更是卑微／危。

對移工的剝削須有對應的意識型態給予其正當性才得以延綿不斷，一如殖民者必須將被殖民者視爲野蠻、劣等，才能心安理得的管控奴僕。龔尤倩指出台灣政府「管理」外勞的概念，是將移工歧視爲一群無法自理、沒有知識的庸民，將之刻板化、犯罪化、問題化、野蠻化。今年五月甫修改的「入出國及移民法」，增列「有特殊貢獻者」得以取得永久居留權，而所謂「有貢獻者」是有選擇性的，三十多萬在台灣賣命從事「3D」（dirty, difficult, dangerous）工作的「外籍勞

工」自然是不在考慮之中，他們的貢獻未被看見，而被看見的是他們在台灣造成的「社會問題」。

關於污名，丁乃非的「看（不）見疊影」發人深省地將外籍家務工作者和性工作者的污名，與華人社會昔日對婢女的文化記憶做了連結；藉由文學、電影和社會史研究的並置閱讀，丁乃非爬梳出這種職業貴賤的階層觀念是種文化記憶，並未隨著奴婢制度一起消失，而是在新時代裡更新了，還加入了階級、種族歧視，益形活躍於現代社會。她暗示，這種文化記憶或許也解釋了何以主流婦權運動相對於掃黃廢娼的賣力，却在外傭議題上却鮮少發言。

意識型態連結

除了經濟的推力和拉力，因資本而形成的意識型態連結（Sassen, 1988）是促成勞工流移的另一關鍵。嚴海蓉的「現代化的幻影」細緻地描繪了中國的打工妹如何因渴望城市的消費／現代世界，成為生產者提供勞力供雇主消費；而其在城市家庭幫傭的「隸從性勞動」所夾雜的各種不愉快、「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勞動經驗，在返鄉時絕口不提，她們更愛談的是自己在城裡的消費經驗，却因而讓家鄉的人也想望城市的消費／文明，成了下一個打工妹，好擺脫一身沾染的「土」氣，於是「流行消費符號鏈從這個世界最發達地區連到中國農村這個世界上最不發達地區」。

何止在中國農村有這樣的流行消費符號鏈呢？藍佩嘉研究在台菲律賓女傭的「跨越國界的生命地圖」亦指出，對於較發達國家的生活型態和消費文化的想像，間接造成了菲籍女傭到海外工作的誘因，而返鄉時對海外消費生活的美化，亦成了更多人想望出國打工的動力。藍佩嘉進一步指出由於龐大的仲介費用支出，使得能夠出國打工的並非菲國最貧窮的人，她們在母國原是中產階級，有些家中甚至雇請農村來的女傭，藍佩嘉分析了這群菲籍海外家務勞工如何透過社會空間的隔離（有雇主的「前台」vs. 休假時的「後台」；「這裡」的女傭 vs.

「那裡」的海外英雄)、不同時間向度(現在的受苦 vs.未來的美景),來整合她們因跨國流移而產生階級認同的矛盾。然而,文中隱而未現的是,這些個人式的認同重整,僅能暫時精神上脫離被社會污名的女傭身份,而她們所傳遞的「流行消費符號鏈」不僅讓自己為滿足日益加深的消費慾望而難以脫離海外流移的日子,也讓更多人捲入移工流移的浪潮。

公民權與移工去商品化鬥爭

在資本擴大積累的邏輯下,不論是中國的農民工,或是各國的移工,都處於被「經濟性吸納」而「社會性排斥」的情境,生活在極度商品化的處境中。但是縱觀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勞動力市場的發展始終都糾結了商品化與去商品化的鬥爭。面對移工種種飽受剝削的處境,許多移工組織以實際行動加入去商品化的鬥爭,把移工做為「人」應有的社會、文化意涵,爭奪回來。龔允倩的報告裡指出,由於現階段在台灣的移工難以從生產面的剝削做為集結的動力,因而改採文化策略,透過詩歌、音樂等多樣的文化形式,創造台灣對移工新的認識論,體認到他們不只是商品,更是活生生的人。在各國進行組織工作的「亞太移駐勞工工作團」則說明了他們在香港、南韓等地的組織經驗,並與台灣相對較難推展的經驗進行比較,其中台灣對移工居留年限及簽證核發的管制,是移工組織工作無法生根的重要因素。龔允倩的報告中亦提及,移工的過客心態會讓他們不去面對結構壓迫下他們自身及本地勞工的處境;而事實上,台灣對移工居留期限的控制,正是造成移工過客心態的重要因素。

成露茜的「跨國移工、台灣建國意識與公民運動」便討論了在跨國勞工流移加速進行的情勢下公民權的問題:誰是公民?她又要向誰申張權利和盡義務?而移工應有哪種公民權利?這篇文章分析了過去以血緣為主導性建國意識的台灣,因移工持久的存在而被迫審視一貫的公民資格認定標準;面對不同血緣的外勞時,台灣當前的建國意識

仍延續傳統的血緣性排他原則，然而在面對大陸勞工時，基於政治考量又不納入中國大陸的同血緣人民，使血緣原則欠缺穩定性。成露茜認為，移工意向、建國意識和空間領域之間的關係可以影響在地移工權利運動的策略；而引領目前台灣建國工作的意識尚未明確，以致無法形成一清晰而一致性的公民政策來因應全球化下在台跨境移工的權利訴求，亦使得台灣的移民權利運動者，面對移工權益被剝奪時往往需向國外組織尋求奧援。基於上述分析，成露茜指出台灣作為一有外來勞動力需求的國家，有三條可能路徑：(一)優遇外國勞工而改變以血統為中心的排他政策；(二)優遇華族而放鬆對大陸人民的政治警戒；(三)以政治、經濟和社會參與為界定公民的基礎。

成露茜所提出對建國意識型態的反省，表面上是針對政策制定者，其實對各種公民權運動的參與者亦是重要的提醒。面對全球化勞工流移帶來的挑戰，在運動策略和遠景的思考上是否也應跳脫民族國家的框架？或者緊守民族國家的疆界，以更強大的力量迫使資本不能跨界流動？

移工研究的反思

除了公民權外，將本專輯論文並置閱讀亦能引發其他面向的反思。丁乃非關於文化記憶的討論，點出對資本國際化的諸多分析中，往往忽略了在地的歷史文化脈絡，過去的階序往往未被置換，而是透過積極的轉換，變成新的不平等。從嚴海蓉的文章亦看出了文化研究中相當關注的語境，對於分析勞工流移的重要性，她指出在九〇年代改革開放的語境下，消費取代了生產，成了人們用以自我界定和被社會界定的尺度，使得無法脫離勞動的打工妹深深陷入勞動與消費間的矛盾的夾縫之中，難以整合自己。此外，原本農民女性不願進城做家庭幫傭，因為這種勞動的尷尬和曖昧可能影響勞動者的身份和名譽。然而，隨著消費語境逐漸壓過了生產語境，雇主變成了「用戶」，成了消費者，不僅讓家庭服務員的工作變得可接受，也讓人們減少了對勞

雇關係中剝削的疑慮。比較丁和嚴同是關切華人社會中家庭幫傭處境的兩篇文章，兩者都指出了家庭幫傭被視為「卑賤」的文化記憶，但在丁所分析的香港和台灣（特別是香港），過去對職業的階序繼續作用，並加上新的種族和階級歧視；而在嚴的文章，我們却看到了原本對家庭幫傭工作的疑慮，在新的消費語境下，轉化為「現代」的「服務業」工作。原本同樣的卑賤性，却得到了不同方向的轉化：在資本主義歷史久遠且深化的香港，家務工作的卑賤性不僅繼續存在，在新的國際分工架構下，更加上了種族和階級歧視；而曾經過社會主義革命、曾是勞動者至上的中國，改革開放後強調消費，使家務工作原本的卑賤性得到逆轉，順利地將農村女性拉離土地，進城販賣勞力供人消費。因而，關於文化記憶和語境的轉換，如放置在政治經濟結構的脈絡下分析，亦即，文化研究和政治經濟研究必須重新接軌，方能獲致更深刻而細緻的理解。

此外，藉由對中國的分析，可讓我們更進一步省思發展的軌跡與遠景。誠如華勒斯坦（Wallerstein, I.）（2001）所言，過去資本主義的發展，仗勢世界體系裡總是有新的區位供其轉移，和總是有尚未進入勞動市場的大塊鄉村部門供其剝削，依此化解了一次次的危機。然而，隨著世界經濟進入新的擴張階段，而世界脫鄉村化（deruralization）的加速進行，華勒斯坦認為，資本主義已邁向終極危機階段。如本專輯論文所指出的，中國市場產生巨大的磁吸作用，使得台灣及世界各國重整腳步。然而，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加速的步伐，把人甩向市場的力道亦日漸增強，為了解決就業問題，九五年計劃便以「促進就業」為中國國家經濟發展優先目標，其中包括「進一步擴大境外勞務輸出」。當龐大的待就業中國人口向外輸出時，其他國家的勞工究竟還能流向何處？還要如何割喉競爭？而當各國資本攻佔中國市場時，中國已於九〇年代後期開始因出口減少出現生產過剩，必須擴大內需。資本主義找到了中國這塊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消費和勞動力市場，解決了它的危機，然而當中國市場亦告枯竭時，資本主義還能找到哪裡？

除了資本主義，難道真的沒有別的道路了嗎？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吳挺鋒，2002，〈外籍勞工的抵抗與適應：周休作為一個鬥爭場域〉，
《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二十三期，頁 103-150。

英文部分：

Brettell, Caroline B. and James F. Hollifield, 2000, *Migration Theory: Talking Across Disciplines*. New York: Routledge.

Castles, Stephen and Mark Miller, 1993,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Sassen, Saskia, 1988, *The Mobility of Labor and Capital: A Study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Labor Flo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nited Nations, 1999, *1999 World Survey on the Role of Women in Development: Globalization, Gender and Work*.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Wallerstein, Immanuel, 2001, "Globalization—Why is it so controversial?" 發表於 2001 年 10 月 3 日，「全球化與世界體系理論研討會」，世新大學蕭宗讓講座。

Weiner, Myron, 1995, *The Global Migration Crisis*. New York: HarperCollins.